

老當益壯的學術大師——洪鎌德教授

廖育信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

曾志隆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簡述洪鎌德教授的學術生涯與主要著作，包含其主要學說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其他學科，探討他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參與，不僅止於著書立說，並且在歐洲與台灣參加政治活動，主張台灣住民之應有地位。在回到台灣任教之後，他撰寫報紙文章與期刊論文，申論台灣應當效法歐美等先進國家制訂憲法，並主張台灣住民應共同享有獨立國格之國家，而非緊緊依附於大一統中國的框架下。洪鎌德教授廣泛的研究興趣與著作，加上身體力行，在台灣民主化的政治運動中，具體表現出學者關心國家大事與全民福祉，至今依然殷勤治學，足顯他為老當益壯的學術大師。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有機的」知識分子、新加坡、白色恐怖與民主化

壹、前言

台灣在 1947 年之後漫長經歷漫長的戒嚴時期，在這個體制中，學界對於馬克思主義、俄文、中國等議題視為圖騰禁忌。然而在這種氛圍中，卻仍有一班雞鳴風雨、後凋松柏的學者，這些人或留在台灣試圖衝撞威權體制，或者漂流海外著書立說，提供台灣學界若干的助益。洪鎌德教授在過去白色恐怖與威權統治時期，也曾經是犧牲品。然而在不盡如人意的環境下，能夠著作等身、治學殷切、桃李滿天，也誠然不易。

在當今言論自由當道，可謂百無禁忌之時，然而回想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之一言堂，至今能夠百家爭鳴，時過境遷，台灣的學術氛圍已起相當大的變化，回顧洪教授過去迄今的學思歷程，和已過七秩的老師如何能繼續在學術「沙場」上爭勝鬥贏，相信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貳、邁向學術殿堂：由疑惑到深耕馬克思學說

洪鎌德教授 1937 年 6 月 2 日出生於新竹，中學就讀於新竹中學，之後就讀台灣大學法律系，後轉至政治系。1961 年獲得國際扶輪社獎學金至西德佛萊堡大學讀政治學與社會學，1963 年轉至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於 1967 年以〈胡適與民國政治〉論文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68-72 年擔任慕尼黑大學研究員與助理教授，1973 年起擔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政府與行政學系講師（英制），1976 年起應國科會邀任台大社會系客座副教授，1980-92 年擔任國立新加坡大學政治學系高級講師（美制正教授），1994 年起擔任台大三研所專任教授（該所 2000 年起改名國家發展研究所，2007 年專任延聘期間滿期，轉兼任教授，於 2011 年由該所退休，轉任他校兼任教授）。另曾於中國、美國多校任高級研究員、客座教授，獲得名譽教授、客座教授、顧問教授頭銜。在台灣也曾於輔仁大學、東海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兼課（現也在國立體育大學兼課）。曾擔任外國之訪問學人，過去亦

獲得多年國科會甲種獎勵（1995-97, 1999-2000 學年）、連震東社經講座（1995 學年）、台灣大學教學優良獎（2001 學年）（廖育信，2004：3-5）。

以上如此琳瑯滿目的學經歷，其實僅為洪教授過去歷練之一小部分。在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講求秩序、講求標準的治學體系中，在大環境中早已顯示出何人能成為衝擊時代、轉移學術氛圍的角色，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當一個少年人在圳裡撿拾到馬克思《資本論》的英譯本，這本被三民主義推落的書將這少年在時日滿足的時候遨翔於寬廣的世界之中，浸沈於無邊的學海之內。在當時將馬克思及其黨徒視為牛鬼蛇神、洪水猛獸、萬惡共匪的台灣，少年人遠遠的離開這個島，朝向馬克思曾生活過的那一片大陸，在那裡，疑惑的他變成了馬克思的研究者、追隨者。

在他還就讀台大政治系的時候，不僅花許多的時間看書，還用許多力氣學習外文，不僅德文嚇嚇叫，俄文也能說得通（蔡祐庭，2004：61-63）。不過如果多聽些洪教授的課，就會真正知道，他在語文上的天分與過去努力學習的成果，展現在他懂得義大利文、希臘文（基本發音與拼字）、波蘭文、法文，連日文也有涉及。

在此種熟稔語文工具的條件下，在南洋的新加坡教書應當算是得心應手，也能顧及配偶的身體狀況。然而，落葉歸根的心是驅使洪教授選擇回到台灣教書的動力。當然反骨難以見容於威權體制之內，他在大學時期便曾投稿於《自由中國》，算是向天借膽，也曾藉著接入國民黨之便免於被捕。不過後來卻因為在《蓬萊島》雜誌上對馮滬祥著作之《馬克思》一書提出沈重又犀利的批判，包含語言工具的使用、文意的掌握、理論的評述、引用參考書目翻譯之嚴謹等等。就今日審視之，此種對治學程度的批判雖可算是對個人之評斷，然治學本求「道重而後尊師」，在欠缺嚴格的思想體系與邏輯演繹能力下，便難以對著重系統性分析的馬克思作一綜觀而客觀的評價，雖有若干針對性之抨擊，也不全無道理。少年人經過十多個年頭，成為沈穩的馬克思學者。

與陳水扁銀鐐入獄不同，洪教授因著「人二室」的阻隔，付出與得勢者作對的代價，只不過此種「監禁」的方式就是被擋於在台灣各大學授課講學的門外。在這段「放洋」時期，洪教授在台灣與新加坡這兩個小島之間找到「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他曾三次到中國大陸講學，扭轉對岸學界對於機械式、教條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轉以有機的、實踐的馬克思主義，亦即西方馬克思主義以迄後馬的路線，來分析國家、社群、個人、知識分子等的互動與衝突。

洪鎌德教授不僅熟悉終日掛在嘴邊的馬克思¹，在治學領域上可謂深邃洋海，包含政治經濟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質化分析）²。這點可由他過去所指導的論文之學科範圍得窺一斑，從交通建設、馬克思主義（經典馬克思到後馬）、勞動經濟學、族群研究（台灣、新加坡）、當代政治思潮（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宗教學（教會組織與管理）、科技管理（風險社會）、兩岸關係等等（曾志隆，2004：6-10）。

至於洪教授多如繁星的馬派著作，與不同時期馬派的分野，留在後面第四段落介紹。

參、洪鎌德教授學術著作的多樣和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觀察指標

一、洪鎌德教授著作、思路的演變

洪鎌德教授雖然不能大方的留在台灣進行教研的工作，但從 1970 年代以後，他便展現出治學的能耐、筆耕的殷勤，在 1970 年代中期便有牧

¹ 與當時終日以鬥臭馬派黨羽與「萬惡共匪」為樂（或者可說是根本就是職業嘴砲或筆砲的打手）不同，洪教授的馬派橫跨當時的法共、經典馬克思主義、官方的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新馬）、後馬克思主義（後馬）。

² 洪教授之所以不敢說他能充分瞭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量化分析，或許與他並不擅長使用電腦有關，但吾人從他所著《當代政治經濟學》不難看出他對敘述統計與統計資料的運用仍能有效掌握。

童出版社出版系列著作，包含《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1976a)、《政治學與現代社會》(1976b)、《經濟學與現代社會》(1976c)、以及《思想及方法》(1977)，這些書談論的範圍包含社會科學初級的綜合論述、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研究法與調查技術、部分學者對方法論的簡述——如舒慈(Alfred Schutz)的社會現象說、馬克士·韋伯(Max Weber)的理念類型——與經濟社會學與經濟學科際整合。

洪老師在 1980-99 年代中期的著作則轉向馬克思主義(這部分留到下節細述)，也留下為數不少的手稿，包含多種多樣的西方馬克思主義，還有在 1983 年的《馬克思與社會學》，1985 年的《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1990 年代初期左右與幾位台灣學者針對官方鬥臭的馬派學說加以辯正筆戰的著作集《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戰集》(1990)、以及大部頭的《馬克思》(1997a)等書。此時研究的重心在於辨明青年和成年的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實為前後連貫，而非認識論上的斷裂，亦即由唯心驟然轉入唯物的跳躍。由於長期在新加坡的，使得洪教授對於新加坡的政經、社文多所知悉，也撰寫一本口袋書《新加坡學》(1994)。

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後，得力於優秀的助理，在短短幾年中連續出版「大書」³，雖然此中仍有若干比例圍繞於馬克思的學說，諸如《從韋伯看馬克思》(1998)、《馬克思社會學說之析評》(1997b)、以及《人的解放——21 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1999)。

與此同時，也有介紹當代各大家的社會學說(如卜地峨、紀登士、諾錫克、舒慈、杜赫尼)的專書《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1997; 1999 增訂)與社會史及其學門發展、各種類型的社會學(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工業社會學、知識社會學)之《21 世紀社會學》(2000)，後者為 1970 年代系列著作之重新彙整與補充的專書，此外還有《人文思想與現代社會》(2000)泛談社會科學之學門及人文思想(如宗

³ 馬克思一家人在《資本論》(卷一)出版前後，因該書頗厚，被他們稱為“das Buch”，本文取其音與意：das(大)與 Buch(書)，意思是「好一本大部頭的書」。

教、語言、歷史等）之發展。不僅如此，他將研究的觸角伸及過去便會用心之政治經濟學領域，而出版《當代政治經濟學》（1999b）⁴。

在 2000 年以後，承繼一貫馬派的研讀而由台北一橋出版社出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系列口袋書之外，還將過去於中國大陸講學所備用的手稿打字集結成書《西方馬克思主義》（2004；於 2010 修改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衰》出版）。

另外，本於對社會學長時間的經營，分別揉合法律、政治兩個面向撰寫《法律社會學》（2001）、與《當代政治社會學》（2006b）。前者為歷來出版頁數最多的書，除探討馬克思對法律的觀點外，還蒐羅涂爾幹、韋伯、帕森思、帕舒卡尼斯、哈伯瑪斯、盧曼、屠布涅、艾德曼、福科等人的相關理論⁵，討論的議題諸如法律的消亡、法律與社會的進化、法律變遷與形式合理的法律、法律與社會體系、法律與商品、慎思的民主、自生體系論、自生法、影像的財產權、法律與規訓。後者除集合《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1997）一書等材料之外，還大幅度改寫福科的權力／知識雙生關係、討論憲政主義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2-2003 年之間一系列的口袋書在 2004 年集結出版為一本「大書」《當代主義》。這本書除討論馬克思主義外，還討論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基本教義等議題，算是當代政治思潮幾種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s），由於原先章節內文過長，出版商要求簡短，故此將先前出版的口袋書與原定出版的書篇幅相比，進行若干削減（約 9% 長度）。洪教授居然能在短短六週裡面，將電腦稿精簡掉大約 30 頁，足見其閱讀能力之超強的一斑。

由於馬派各分支的學說與經典馬克思學說的內涵，得要向前回溯之前的康德、黑格爾、費希特之理論，故此 2006-2007 年，僅僅費時一年多的功夫，便接連出版了《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

⁴ 上述這些書的出版商都是台北的揚智文化事業。

⁵ 實際上該書增定版應該還有第 15 章，但因出版社認為太長，便不收錄改編。

(2007a)、以及《黑格爾哲學之當代詮釋》(2007b)兩本書，直指馬克思學說源頭的幾股力量，並馬克思學說的轉向。由此得出馬克思受到費爾巴哈轉型批判法的影響，加上青年黑格爾門徒有活力、反骨的批判性，馬克思將之應用於對人性、生產活動（勞資關係）、歷史、國家之上，洪教授不僅分析，並略微應用於運動哲學的析論上，出版《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與演變——略談對運動哲學的啓示》(2010)。

近來洪教授回到過去曾專注研究政治學門中的國際關係（IR）領域，即將出版之《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2011)，不僅分析當中幾路學說之大要，並結合時事（第二次波斯灣戰爭），加以探究，還回溯源頭探究經典與近來的現實主義、大同思想、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包含新馬與後馬）。

綜上所述，洪鎌德教授原先的學術領域應該是以政治學為主，然觀諸數十年之著作，不僅範圍涵蓋本科，還以社會學為大宗，佐以經濟、法律、哲學等面向，討論國家、人性、社會科學、宗教、運動哲學。

回顧過去台灣執政黨對於意識形態的牢抓，以致於洪教授無法提前將馬克思主義具有生機、非教條、非機械的部分，也未經過教條馬克思主義者詮釋的原創馬克思主義完整的引介給台灣學者與學子，以致於至 1990 年代晚期以前，談到馬克思主義，還是令人感到一種背叛、反秩序、大鍋飯的不安之氛圍，而沒有真正體現到在馬克思心目中那個沒有異化、沒有剝削的美麗之新未來。

過去在意識形態的禁錮，導致洪鎌德教授只得在中國大陸灌輸西方馬克思主義，乃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路學說。雖然中共向來牢抓意識形態之教導，然而相對於台灣當權者將之當成盜賊讎寇，而極力抹紅，此點也可算是洪教授在三民主義還沒請他吃飯之前，馬克思的黨徒終於找到馬克思的同路人，一個曾經對馬克思主義抱持好奇心的少年人。

二、台灣化的政治思想學者與政治參與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牢牢掌控種種意識形態的論述，透過教科書一言堂的灌輸、醜化馬克思主義，視之為洪水猛獸、萬惡共匪之思想源頭，而以獨尊儒術、恪遵道統以實行學術思想之統一。在此格局下，遑論討論、闡述具有生機的、活潑的、官能的青年馬克思之思想，在學術圈內悉數以孫中山、蔣介石對馬克思及其信徒批判之論述為準。除此之外，對於學術著作也好、專書也罷，坊間的期刊雜誌之思想箝制更是嚴密。因此在台灣對於馬派之論述呈現一面倒的態勢便不足為奇。只是左派的思想，或較為激進的關點之論述也不免遭受妖魔化的對待，如女性主義、基本教義、社會主義、環保主義等意識形態。當然，在解嚴之前也對治學工具之研究方法與學科加以控管。

洪教授雖在 1990 年代初期才返回台灣教書，但在此之前便藉著著書立說，引介西方著名學者和著作，討論眾多學科，評介許多當時在台灣能見度不高的學者與其理論，實為難得。

在威權體制統治之下的台灣，無論是政治思潮、社會學說，幾乎側重於兩種類型的學說，其一為東方的「儒家道統」、「仁君治術」的學說，另一則為右派的、西方的政經法社之理論。在這兩種思潮的夾擊下，以台灣為本體、為原鄉的文學、歷史遭受極大的排擠。加之，在國民黨統治期間，閩南語、客語和其他台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遭受甚不平等的對待。因此，能站立在台灣本位立場之學者，以身為台灣住民之立足點來看待台灣的政經社文之發展，實屬難得。

雖然台灣在 1986 年前後解除戒嚴，然而受國民黨長期統治之桎梏，加上部分御用學者成為國民黨統治中的騎牆者，無形在諸多山頭「控管」學術氛圍下，在許多學人內心裡有個「小警總」，抑或成為福科(M. Foucault, 1926-84) 指出的，每個人成為自己的獄卒，成為自己的監視者。故此，自己身體的技術運用在治學之上，便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檢查，避免得罪執

政當局。畢竟，不知當時難得自由的空氣是否會如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後再度的凝滯。

洪鎌德教授在白色恐怖時期曾大膽的接觸《自由中國》出版人員，在留學歐洲時期於 1967 年左右，參與當時暗暗成立的歐洲台灣獨立聯盟之活動，並曾擔任主席，致使在「抓耙子」無所不在的條件下，「榮登」黑名單。相較於許多學人以爲事不關己，如日人統治台灣初期所言台灣住民「貪生怕死」，洪教授此種身先士卒的精神，與當時歐洲 1968 年學潮中追求解放的風氣，也和馬克思嚮往從國家、布爾喬亞的宰制下解脫出來的精神相符。

後來，洪教授又針對馮滬祥譯著之馬克思專書，毫不客氣的指陳其各種學術上的缺失、著作之不謹嚴⁶，在 1990 年代初期至中期又針對台灣當時算是新鮮之「新馬克思主義」乃至「後馬克思主義」，和台灣的社會學學者「切磋」，進行一場頗爲激烈的筆戰，也針對擁有較多自由空氣的新加坡之語言政策、政治制度與台灣進行比較。連過去「新國家連線」亦曾經邀請洪教授講演馬克思之理論，馬克思在台灣算是找到一個後繼的發揚者。由此足見，長期享受自由空氣的洪教授，相對地站在較爲高處的地位，立足台灣、放眼天下。

不僅如此，他在許多捍衛台灣主權之政治運動中也是熱心的參與者，在許多的抗議活動裡能夠看見他的身影。也在其著作中關於台灣議題的字裡行間看見對台灣這塊地土的關懷。相較過去高喊「反共救國」而如今卻往中國大陸跑的御用學者，洪教授以實際行動，表現對台灣的熱愛。這也是他何以放棄新加坡高薪教職，而返台教書的原因。

洪教授不僅止於學校授課與撰寫書籍，他也撰寫不少篇的文章，與投稿報紙。在字裡行間透露出洪教授並非只是引介外國學說，分析其精髓而已。他也以其縝密之思維，藉由觀察世局之發展，與台海兩岸的政經互動，

⁶ 這裡洪教授使用化名，然認真考察其字裡行間，洪教授之身影穿梭其中，真正作者爲何當然呼之欲出。

而評時論政。如以西馬觀點，此為「有機的知識分子」之社會功能，而不致讀死書，追求無邊空泛之學問之書匠而已。

洪教授關心台灣的民主化，也堅決反對中國企圖以武力併吞台灣。由台灣放眼天下，觀察能使人安身立命之普世價值。在 2005 年擔任台灣歐洲研究學會理事長時，他在《財經文化周刊》中〈中東歐國家制憲啓示錄〉一文，指出在「蘇東波變天」之後，民主化已經成為普世化之浪潮，伴隨此政治變遷者為，各國紛紛制定或修改憲法，迎接政體轉型為民主化的國家。在許多國家中，共黨一黨專政成為過去，並且投入西式資本主義的懷抱。台灣經濟奇蹟雖然部分歸功於良好的經濟發展環境與公共政策，但中小企業的進取努力，與政府採取開明專制也不無關係。經濟的發展推動政治的變遷，也促使台灣迎合歐美自由化，舊蘇聯推動的「新思維」之政治改革，進行民主化，而以「寧靜革命」進行政權轉移。

相較於此，中國一味抗拒政治的逐漸鬆綁，不只緊抓意識形態不放，並且漠視人民基本權利的申張。因此，上訪與阻訪的戲碼在中國各地天天上演，民怨也逐漸沸騰。台灣則歷經各種各樣在野之藍營的抗爭與杯葛，卻能堅持其民主價值，並且展現出台灣住民能逐漸跳脫從屬於中國之核心價值，形構自身獨立政治實體與民族性格，這正是民主深化帶來之最大作用——瞭解人民當家作主，是國家的主人。

另一篇 1995 年刊於台灣時報文章〈李總統應勇於凸顯台灣的國家主權〉，以民進黨對於李登輝主張的台灣住民國家認同與走向進行的民調，顯示一半的民眾並不真正瞭解李登輝的觀點。在中國以「一個中國、三段論述」的霸權、主宰者之思維，實難瞭解李登輝之論點。由於過去國民黨長期統治台灣，營造出台灣與中國緊密連結之意象，而沒有誠實凸顯更多時期台灣其實僅僅作為一流亡政府的根據地（明鄭、台灣民主國），或是邊陲之地（清領、日治），甚至是擄掠人口、搶奪資源的寶庫（三國、元帝國、國民黨在二戰之後至國共內戰敗退遷都到台北為止）。台灣與中國即使立刻統一，在同文同種的條件下，吾人便會發現生活習性差異極大，

思想觀念極其不同的中國大陸住民（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與台灣儼然像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

最後，在 2002 年舉辦的「多元語言政策研討會」中，洪教授藉由分析新加坡的語言政策與族群組成，探討人口不足台灣兩成，國土面積不足台灣 5% 的小國，能採行平等對待主要語言，堅決維持國格之獨立完整，實在不是長期壓抑地方語言、在中國與台灣兩個名詞上含混其詞的國民黨政權所能比擬的。

肆、台灣「馬克思學」的耕耘者⁷

一、洪鎌德的政治參與和「馬克思學」的引介

提到洪鎌德教授的另一項學術領域的貢獻，就不得不提及他對於馬克思（Karl Marx, 1818-83）及馬克思主義（Marxism）⁸ 的傑出研究成果。

⁷ 限於篇幅，在此只能扼要討論洪老師對於馬克思（及恩格斯）理論學說的詮釋，有關「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及「後馬克思主義」請參閱附錄所列之洪老師的相關著作與主編之叢書。

⁸ 一般所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實是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95）兩人思想的結合。儘管馬克思在生前雖然曾經對他的女婿拉法格（Paul Lafargue, 1842-1911）提到：「我本人不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這意味馬克思本人反對後人將他的思想體系化、物化（reification）、甚至是意識形態化。然而，經由恩格斯、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普列漢諾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考茨基（Karl Kautsky, 1854-1938）、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以及史達林（Josef V. Stalin, 1878-1953）的扭曲之後，馬克思的思想終究還是無法避免意識形態化，甚至是教條化，成為「正統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或「官方馬克思主義」（Official Marxism）的理論源頭。而後又有與「正統馬克思主義」抗衡，由匈牙利的盧卡奇（Gerog Lukács, 1885-1971）、義大利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德國的寇士（Karl Korsch, 1886-1961）等人所奠基，普遍流傳於西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與稍後衍伸出來的「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m）及「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等流派出現。請參閱洪鎌德（1988：2、209-10；1996：9、69、203；1997a：387, 395-400, 409；1997b：340；2002a：96-97、110-11；2004：243-44、250）。

除了解嚴前的《馬克思與社會學》（1983）及《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1985）⁹之外，解嚴之後，特別是1990年代至今，更是洪謙德教授著述的高峰期。¹⁰

雖然他謙稱正式踏入研究馬克思的機緣是因為在慕尼黑大學教學期間「適逢1968年德國學生運動學潮爆發，一方面體認自己在馬克思方面的基本知識無法同德國學生溝通，因為德國學生對這方面了解十分深刻；再者，德國學生十分好辯，只好下工夫鑽研。所以，基礎是在當時奠下的」（蔡祐庭，2004：73）¹¹。但是，洪老師其實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與日後研究馬克思的學說結下了不解之緣（蔡祐庭，2004：66-68）。¹²

或許是大學時期與雷震、胡適、殷海光等自由主義者的往來，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有所質疑，以及在德國可以接觸馬克思的德文著作原典與歐美學者對於馬克思學說的詮釋，使得洪老師日後對於馬克思學說的評價，是以「馬克思學」（Marxology）¹³的路徑為基礎（Gorman, 1995: 557-60），對於馬克思的理論學說既有同情的理解，又有深刻的批判，而不同於黨國體制下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者，為了宣揚「反共復國」，獨尊三民主義，將馬克思的理論學說視為毒蛇猛獸。

⁹ 這兩本書得以在台出版頗具意義，除了政治環境仍屬戒嚴之外，就是洪老師當時還被列入不得返台任教的「黑名單」之一。

¹⁰ 有關洪老師非馬克思主義方面的著述，請參閱前一節。

¹¹ 請參閱蔡祐庭，〈當三民主義請馬克思吃飯——洪謙德教授訪談錄〉，原文刊載於《竹塹文獻雜誌》第14期（2000年1月號，頁20-32），後收錄於施正鋒主編，《馬克思學在東方——洪謙德教授66歲生日祝賀文集》（台北：前衛，2004年）。

¹² 另外，在大學求學期間，洪教授雖然與中國來台的左翼知識份子如鄭學稼、胡秋原、嚴靈峰等人有所往來，但他也直言馬克思學說在當時只是自我啓蒙的研究，不如自由主義來的重要。

¹³ 如前所述，一般所論及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是馬克思與恩格斯兩人思想的結合，是恩格斯一手所塑造而成的思想體系，但是法國學者呂貝爾另外提出「馬克思學」的看法，並且認為馬克思學與馬克思主義不同，其原因在於呂貝爾（Maximilien Rubel）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主要肇因於恩格斯將馬克思的著作視為一個完整體系，然而事實上馬克思的著作並未為其學說的體系化提供任何基礎。因此，呂貝爾主張馬克思學與馬克思主義應予以分辨，認為馬克思學應該是回歸馬克思的著作，以探求馬克思理論學說的科學。

馬克思本人固然主張階級革命，大聲疾呼普勞階級（Proletariat）¹⁴ 要起來革命推翻資本主義（Capitalism）¹⁵ 體制（Braudel, 1993: 28），也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馬克思最終的理想社會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Marx, 1996: 215），「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種過渡，並非如前蘇聯、東歐、中國、朝鮮、古巴等共產政權一般，是由共產黨遂行一黨極權統治（Marx & Engels, 1955: 23）¹⁶。黨國體制下的馬克思主義批判者或許是迫於政治情勢，刻意批判馬克思的這一面，而未能客觀的詮釋馬克思的理論學說。

從「馬克思學」的立場出發，洪教授認為要掌握馬克思本人的學說精髓，必須深切的認識「馬克思的學說是圍繞著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而展開的」（洪鑣德，2002a：2）。這必須觸及 18 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資本主義體制，以及馬克思在哲學上的思考。¹⁷

由於產業革命（Industry Revolution）如火如荼的展開，加上亞丹·斯密（Adam Smith, 1723-90）等人的學說強調社會分工與競爭，致使社會逐漸分化出資本家與普勞階級。其中普勞階級每天孜孜矻矻工作，只能以微薄的工資度日，資本家卻坐享普勞階級的勞動成果，使得勞動過程變成一種「異化」，亦即人在勞動過程中，與自己的生產產品相異化、與自己的勞動過程相異化、與自己的類本質（species-being）相異化、與他人相異化（Marx, 1977: 71-75）。¹⁸

¹⁴ Proletariat 中文通譯為「普羅階級」，但洪教授主張譯為「普勞階級」才恰當，因其符合「普遍勞動」（包括勞力與勞心）之意。況且，可與時下帶有「專業」（profession）意涵的「普羅汽車」、「普羅齒科」、「普羅飲水機」等廣告相區隔。

¹⁵ 依據法國年鑑學派歷史學者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02-85）的說法，「資本主義」一詞是二十世紀初才開始被廣泛的使用。

¹⁶ 馬克思雖然在與恩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當中，賦予共產黨領導普勞階級革命的角色，但並未賦予共產黨人於推翻資產階級體制之後，擔負統治的任務。

¹⁷ 有關馬克思的生平，請參閱洪鑣德（1997a：1-15 章；2002b：第 1 篇）。至於馬克思的思想來源，請參閱洪鑣德（1983：第 1 章；1986：第 2 章；1997b：第 1 章；2010：1-9 章）。

¹⁸ 有關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請參閱洪鑣德（1983：第 5 章；1986：第 3 章；1997b：3-4 章；1997a：第 16 章；2002a：2-5 章、第 13 章；2010：10-14 章）。

如何將人類從這種自我異化下解放出來？洪教授認為這要溯及馬克思哲學上的源頭，在於馬克思受到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與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72）的影響，既反對黑格爾將資產階級的人之表象當成現代人的本質，同時反對費爾巴哈將人的概念抽象化（洪鎌德，2002a：2），主張「勞動」才是人的本質。因此，如何遂行「人的解放」？馬克思認為，這是普勞階級無法避免而必須接受的歷史使命。換句話說，普勞階級起來革命就是達成「人的解放」的唯一方法。這也就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的「導論」提到「解放的頭是哲學，它[解放]的心是普勞階級」的原因（洪鎌德，2002a：13）。

關於這項「使命」的賦予，洪教授則認為，馬克思其實是讓「普勞階級太沈重」，這是「馬克思對從事工業的勞動階級之性質、功能的誤會」所致。因為當馬克思引進「普勞階級」這一個概念時，「正是工業化高潮發生，而工人抗議不絕之際。當時勞工大眾要求其待遇應是法國大革命所宣示的實質性自由、平等、博愛。在工業化初期手工藝者商業特權的喪失，使他們群起反對工業化、實業化。馬克思誤將這些手工藝者的抗議當作是普勞的反抗與自保，把手工藝者為求工作與勞動在工業社會中獲得保障的組織性活動，看作為普勞階級要揚棄資本主義，也誤把法國大革命的收尾看作社會主義的開端。事實上工人對工業化、自動化、工廠老闆的不滿被馬克思誤解為工人對工業化的普遍性反彈」（洪鎌德，2002a：121）。

最後，如果普勞階級革命成功、推翻資產階級體制之後，馬克思究竟為「人的解放」描繪出何種生活願景？對此，洪教授認為馬克思的解放觀與自由主義之間有關連性，因為「馬克思的自由觀結合了兩個因素，都是受到自由主義的自由觀之影響：其一，自由是從權威及其他限制中脫逸出來；其二，自由為個人能力才華的充分發展」（洪鎌德，2002a：127）。換句話說，「解放」的目的對於馬克思而言，就是「自由的實現」（洪鎌德，2002a：5）。

然而，馬克思所秉持的自由理念又不同於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消極自

由，而是更進一步的主張絕對的自由，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一個從各種限制、各種必然脫離出來的新社會，或新領域——『自由的領域』。」也就是「把自由主義推到極端，讓每個人皆能充分而自由地發展與實現其本身」（洪鎌德，2002a：125）。要將加諸在人類身上的一切典章制度，舉凡經濟、政治、宗教等等枷鎖完全去除，讓人毫無拘束的自由自在生活。

相對於馬克思的樂觀與期待，洪教授精闢的指出，馬克思的「解放」主張無法解決一項難題（洪鎌德，2002a：127）：

馬克思的自由觀結合了兩個因素，都是受到自由主義的自由觀之影響：其一，自由是從權威及其他限制中脫逸出來；其二，自由為個人能力才華的充分發展。但要把這兩部份有效結合在一起就要靠一個概念，那就是富裕。人類要如何獲致富裕呢？我們知道，富裕是與匱乏相對照的，但匱乏卻如影隨形，緊跟著人類而出現，只要人的需要超過滿足需要的手段，人便感受匱乏，更何況自然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要克服匱乏談何容易？克服匱乏的首急之務為探討需要的結構，但需要的結構是靠價值來形塑，在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唯一的標準來規定。但面對有限的自然資源，無限的需要結構就變成人的匱乏，而非馬克思樂觀的富裕。由是絕對自由與其基礎——富裕——無法對等平行，或稱絕對自由的基礎一旦不存在，自由也就無從實現。

換句話說，如果「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是馬克思所念茲在茲的，那麼如何提供充分的資源使得人人得以自由，並充分展現其才華能力？馬克思卻是沒有明白的告訴後人，這也致使馬克思「人的解放」之後的共產主義社會最終只是一種烏托邦社會的質疑。因此，總結說來「馬克思對於共產主義的看法是憑藉著信仰和思辨，而非奠基於經驗事實和科學觀察之上」（洪鎌德，2002a：199）。

從以上扼要舉出洪教授對於馬克思理論學說的詮釋可以看到，洪老師為台灣的「馬克思學」發展開闢出一條蹊徑，這也是他對台灣的「馬克思學」最大的貢獻之處。

二、馬克思主義的撥正者

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乃至實務的瞭解，其實犯了相當的錯誤。首先，國民黨所理解的馬派人士與馬克思主義，其實已經是經過恩格斯、考茨基、列寧、普列哈諾夫、史達林另闢蹊徑、重加詮釋或予以修改的「變體」。「原型」的馬克思主義，則指青年的馬克思主義和成年的馬克思主義二者。另外，傳布於東歐、德國乃至於二戰之後的美國、義大利、拉丁美洲的，為西方馬克思主義之分支，演變至後來成為新馬克思主義，乃至後馬克思主義的學說。

國民黨在中國與共產黨數次的政治鬥爭，最後以丟失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作收，加之其背後推波助瀾者之舊蘇聯正為奉「官方馬克思主義」、「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為張本的政權，故此實質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便死抓「國父孫中山」對馬克思學說之批判，和「民族領袖蔣介石」以儒家思想攻訐馬克思理論與「實務」之謬誤，而形成一面倒之論述。

如前一節所述，青年馬克思強調追求人的解放，尋求整全之人的實現，亦即從生產勞動的異化之揚棄，尋回自己。成年的馬克思則承襲黑格爾歷史必然性的論點，指出在資本主義成為昨日黃花之後，取而代之的將是高生產水平的社會主義，乃至無異化、無剝削的共產主義。不過從馬克思之後，唯物辯證法從社會、人的層次被套用於自然界，成為一種萬物秩序的定律，恩格斯及其後繼者將之當成顛仆不破之金科玉律，認為人的社會依循此種螺旋上升的正、反、合之辯證過程，以使人身處之社群、社會達致完美。

雖然馬克思強調將來資本主義的消滅乃是由於無產階級以暴力的手段推翻資本主義，在此之後有短期的無產階級專政。並且，無產者的聯合乃是自動自發的，其目的在於追尋一個更為公平的經濟秩序之安排。並且，國家在將來無異化、無剝削之共產主義社會終將不復存在，國家的消亡成為必然之趨勢。

雖是如此，馬克思無須鬥臭資本主義，剛好相反，他宣稱人類的生產水平在資本主義的階段被提升到最高的階段。真正要群起攻之的是經濟的

分配，與資本家同政府（國家、統治者）的勾結。當然以國民黨強調槍桿子指揮黨、黨指揮國的基調下，此種會威脅國家「存在」的論述，與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的論調必然成為箭靶子，被國民黨鬥臭自然不令人感到意外。

按照洪教授針對馬克思種種資料加以觀察，他認為馬克思的國家觀至少有數種：國家具有功能性（官能性、有機性）、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工具、國家是社會的寄生蟲等等。不同時期的馬克思對於國家的觀點有不同的論點，當然在背後支持其論述的就是在不同時期影響他的人。早期馬克思受黑格爾的影響，認為普魯士的君主立憲制度已經攀登至歷史的頂峰，國家為一有機體；之後由於其出版志業為普魯士保守政權所毀壞，而認為國家僅僅是統治者實行暴力之後盾的面目；在路易·波拿巴復辟之後，他認為法國僅僅是吸吮大量社會資源，以養活一大堆官僚、軍隊的寄生蟲；在《資本論》之後，馬克思認為國家僅僅為資產階級利益的護盾，為無產階級亟欲摧陷廓清者，亦為明日黃花。

相對於這些不同樣態的國家觀，由於國民黨一言堂的論述基調是「資本主義善，共產主義惡」¹⁹，為附從於資本主義，和代議政治（西方民主，特別是美國的三權分立，只是加上兩個功能不整的考試與監察權），而共產主義則被描繪為「均貧」的、「大鍋飯」式的集體勞動。當然台灣初步的經濟發展依附於美國的經濟援助，和附麗於日本這隻大雁的技術流、資本流，因此相對於先強調平均、再講究富足的「爆炸式」成長，經濟上的豐富顯然不是後者可及的。

其次，西方、新馬以迄後馬的學者，則分別對青年的馬克思的學說重加詮釋，也對生態環境、兩性平權、帝國主義、保守與自由主義的對辯加以關心。當然，在西方追求經濟的自由化與強調競爭的發展路徑下，無可避免的是貧富差距的產生，南北半球財富的分配不均等議題。過去由於台灣一味地追求經濟發展，一切向「錢」看，自然在環境議題上採取漠視的

¹⁹ 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農莊》一書中以「四足者善、二足者惡」暗諷主張共產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乃為共產黨徒的空想。真實的情況應該是「四足者善，二足者更善」。

態度，也對於不利於經濟發展與統治者權力正當性之論述加以限制。故此，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對於馬派的認識僅只於斷章取義和以偏蓋全的批判，也流於意識形態之對抗。加之，由於強調資本主義的優越與民主體制重視分配的富足（其實是扭曲經濟資源以挹注工商業發展），反而忽視兩性的平權、文化素質的提昇和與當代國際政經思潮接軌的軟實力之展現。而這正是當今重視人本、強調人性反璞歸真之現代文明所必須者。故此，西方馬克思主義強調有機知識份子的重要、文化霸權的宰制、帝國主義的橫征暴斂，新馬克思主義的厭戰反帝、重視國際財富分配、反對剝削女性與弱勢者（含少數民族）、重視多元文化，以至後馬克思主義結合保守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政治思潮、社會學理論。這些論點在台灣的不斷鼓吹，政治逐漸自由化的台灣，終於逐漸催生兩性平等、尊重原住民與少數民族、照顧經濟弱勢者的社會風氣。而將此種真正宣揚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論述，其實也可算是馬克思重視人本之非物理性的學說性目標。

另外，公民在社會、社群中個性之發揮，其實也是馬克思強調個人特殊性、殊別性，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件。一味的強調合群、服從的機械性之人際關係與群性，而藐視、忽視個性的發揮，最終得到的僅為失去官能性、生機活潑的機械性之個人。從庸庸碌碌的勞動，到對執政掌權者之無條件的順服，卻又認為自己應該是自由的無機之個人，其實正是黑格爾所言，僅為帝王統治時期，君王一人獨知自由之悲慘世界。

除引介理論的貢獻之外，洪教授還有另一個值得提及之處，他在眾多的著作中使用為數不少的圖表，將頗為艱澀的理論加以解釋，這使得有意進入社會學、政治學殿堂之學人得以一目了然。

例如過去對馬克思、西馬、後馬各學派析論物質基礎之「下層建築」與意識形態之「上層建築」，或者討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時，讀者往往得抽象的理解其深邃的概念，洪教授則以簡潔的圖，便簡單的加以說明。另外，近年出版的書則穿插豐富的漫畫、照片來對應內文所提及之學者或思想之中核，也便利讀者閱讀，進行思路的連結，加深其印象。

伍、結語

洪鎌德教授雖已屆從心所欲之年，然仍殷勤持續研究、筆耕不輟，近日又將出版新書（2011）。雖然經典的馬學在當代學界並非當紅，但於古典社會理論被稱為三大家之一，顯見其地位之重要。加之，馬克思之徒子徒孫之理論闡述廣泛、派別眾多，許多也成為當代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法律社會學，乃至宗教學（如解放神學）之背景理論。故此，能將如此龐雜廣泛的學者、理論之神髓加以掌握，實非容易之事。不僅如此，能縱橫於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等學門之跨學科研究，為當今重視學科整合（科際整合）的學術圈所重視者，而洪教授的研究範圍早為如此。

洪鎌德教授在國外與返台之後，一面匡正各派馬克思學說之精髓，發揚馬學注重人性之復歸，與對未來美好社群的憧憬。並且提供台灣學界國外各種社會學、國際政治、國際關係、法律社會學等領域的理論，另一面也與台灣學者進行理論層面上的交流與對戰，特別是在台灣缺乏先進資料之新馬、後馬理論上頭。這種學術上的進取成為執政者鷹犬爪牙的「抓耙子」難以相容，與過去流於清談的「學究」大異其趣，或是騎牆的機會分子不同，更與未經凜冽寒風、啣金湯匙出生的王宮貴族不同，當有些人能靠著見風轉舵而得利，洪鎌德教授在學術圈的經營乃是本於一分的天才，加上九十九分的努力，才有一百分的實力而有此成果，可謂名實相符。例如，固然吾人羨慕他在語言使用上的才能，但這些能力卻是因他有興趣之下，以相當時日極其努力的成果。同樣地，在闊長深高的學術研究能力中，也是經年累月，飽讀書籍，勤做筆記才能累積如此的學問。

就洪鎌德教授過去散記的筆記中，可以發現他讀書方法之講究，先由該種研究之經典書籍入門，再加以比較、析評，再加入自己的觀點。同理可推，在參與台灣民主化的漫長過程中，他不滿於蔣介石為首之國民黨政權企圖以一隅台灣代表全中國之荒謬情事，而主張台灣住民應具有自己獨

立的政治位格，而不應淪為「反共跳板」、「自由櫥窗」，在 1960 年黨外運動與海外台獨運動動輒判刑的局面下，尚且勇於站出來發聲。這足以表現出他對於政治現象的解讀絕非停留在散亂的觀察與曲從於他家之說，意圖藉由行動表現出台灣應獨立於「中國」這一混雜地域、政治、國際分合、冷戰框架的畸形產物，以批判國民黨長期以來企圖以經濟成長與發展，來往自己臉上貼金，炫耀其政績的事實。

當年少年人愛著他的家鄉，卻飄洋過海的去追尋馬克思成長的腳步，一天他被三民主義請吃飯，也在國家發展的學術氛圍中繼續他長年成為空中飛人的旅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這個曾經恨馬克思入骨的島和那個「昭南」小島往復的來回，而是當馬克思的幽靈仍彷彿在學術殿堂中闖蕩的時候，馬克思徒子徒孫中的一位，當他從大圳裡拾起資本論被的那一刻起，就已經踏上他「實踐哲學」的旅途。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學術界對各種外國有名學者理論之引介、專書之譯述有著深遠的影響，而參與其中，卻也曾成為威權體制學術一言堂犧牲品的洪鎌德教授，老當益壯的學術大師之稱號應屬實至名歸。

參考文獻

- Braudel, Fernand (楊起譯), 1993。《資本主義的動力》(*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Gorman, R. A. (編)(馬欣艷、林泣明、田心喻等譯), 1995。《新馬克思主義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Neo-Marxism*)。台北：遠流。
- Marx, Karl (Terrell Carver, ed.). 1996. *Later Politica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Samuel H. Beer, ed.). 1955.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Marx, Karl. 1977.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5th rev. ed.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 洪鎌德。1976a。《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台北：牧童。
- 洪鎌德。1976b。《政治學與現代社會》。台北：牧童。
- 洪鎌德。1976c。《經濟學與現代社會》。台北：牧童。
- 洪鎌德。1977。《思想及方法》。台北：牧童。
- 洪鎌德。1983。《馬克思與社會學》。台北：遠景。
- 洪鎌德。1985。《傳統與反叛——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探索》。台北：台灣商務。
- 洪鎌德。1988。《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台北：森大。
- 洪鎌德。1990。《西方馬克思主義論戰集》。台北：森大。
- 洪鎌德。1994。《新加坡學》。台北：揚智。
- 洪鎌德。1995。〈李總統應勇於凸顯台灣的國家主權〉《台灣時報》5月25日(<http://taup.yam.org.tw/comm/comm9507/tpdc5714.html>) (2011/6/30)。
- 洪鎌德。1996。《跨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台北：月旦。
- 洪鎌德。1997a。《馬克思》。台北：三民。
- 洪鎌德。1997b。《馬克思社會學說之析評》。台北：揚智。
- 洪鎌德。1997c。《社會學說與政治理論——當代尖端思想之介紹》。台北：揚智。
- 洪鎌德。1998。《從韋伯看馬克思》。台北：揚智。
- 洪鎌德。1999a。《人的解放——21世紀馬克思學說新探》。台北：揚智。
- 洪鎌德。1999b。《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0a。《21世紀社會學》。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0b。《人文思想與現代社會》。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1。《法律社會學》。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2a。《人的解放》。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2b。《馬克思主義》。台北：一橋。
- 洪鎌德。2002c。〈新加坡多元語言的教育政策之評析〉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頁 215-36。台北：前衛。
- 洪鎌德。2004a。《西方馬克思主義》。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4b。《當代主義》。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06a。〈中東歐國家制憲啓示錄〉《Taiwan News 財經文化周刊》215 期，9 月 29 日，頁 92-93。
- 洪鎌德。2006b。《當代政治社會學》。台北：五南。
- 洪鎌德。2007a。《從唯心到唯物——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的衝擊》。台北：人本自然。
- 洪鎌德。2007b。《黑格爾哲學之當代詮釋》。台北：人本自然。
- 洪鎌德。2010。《馬克思的思想之生成與演變》。台北：五南。
- 洪鎌德。2010。《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衰》。台北：揚智。
- 洪鎌德。2011。《全球化下的國際關係新論》。台北：揚智。
- 曾志隆。2004。〈洪鎌德教授指導博碩士論文一覽表〉收於施正鋒（編）《馬克思學在東方——洪鎌德教授 66 歲生日祝賀文集》頁 6-10。台北：前衛。
- 廖育信。2004。〈洪鎌德簡歷〉收於施正鋒（編）《馬克思學在東方——洪鎌德教授 66 歲生日祝賀文集》頁 3-5。台北：前衛。
- 蔡祐庭。2000（2004）。〈當三民主義請馬克思吃飯——洪鎌德教授訪談錄〉《竹塹文獻雜誌》14 期，頁 20-32。收於施正鋒（編）《馬克思學在東方——洪鎌德教授 66 歲生日祝賀文集》頁 61-76。台北：前衛。

A Great Master of “Young-Old”: Dr. Lien-Te Hung

Yu-Hsin Liao

*Ph.D.,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h-Lung Tse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s
Soochow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areer and major writings of Dr. Hung Lien-te, including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then deals with participat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ing of Taiwan. Dr. Hung not only published books, wrote journal papers, and contributed newspaper articles but also advocate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 After returning to Taiwan and starting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he wrote numerous articles and journal papers. He believes that the Taiwanese are entitled to have a state of their own without being impos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unified China. Dr. Hung has broadly interests in many disciplines, and he has had over 40 books and 300 articles published so far. He has showed that he should not be absent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is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Dr. Hung is truly a great master of “Young-Old.”

Keywords: Marxism, “organic” intellectual, Singapore, white terror, democratization